

2010 年中日关系史研究述评

高士华 徐志民 高莹莹 李仲明

一 中国方面的研究

(一)中日共同历史研究

2010 年中日关系史研究中,最具看点的莫过于中日两国学者对始自 2006 年底的中日历史共同研究的评价。2010 年 1 月,中日两国各 10 位学者组成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在经过 3 年多的共同研究之后,宣布中日历史问题的第一阶段研究工作结束,并公布了研究报告。一时之间,国内外学界、媒体对中日历史共同研究给予了高度关注。《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邀请了部分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的部分中方委员、国内著名的专家学者,就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及其报告以笔谈的形式发表意见。步平、何理、胡德坤、李文海、林晓光、王建朗、王晓秋、徐建新、杨奎松、臧运祜、章百家、张海鹏等,在《笔谈: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10 年第 1 期)一文中,分别就什么是历史问题,中日两国历史认识的分歧点何在,历史认识的分歧能否解决,以及如何解决中日两国历史认识的分歧等问题,提出了各自的观点,普遍认为“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是回答上述问题的一次尝试”,“迈出了解决中日历史问题的第一步”,肯定了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绩。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第一阶段的工作虽然结束,但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所要解决的历史任务并未完全解决;中日共同历史研究虽就不少中日历史问题达成了一致,或基本一致的观点,但仍有一些分歧或问题,需要继续或进一步开展共同历史研究。为此,《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邀请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的中日两国委员,以及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聘请的外部执笔者、对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感兴趣的国内外专家学者,继续就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本身及其遗留的历史问题发表对谈文章。《抗日战争研究》2010 年第 4 期,组织了两组 4 篇文章,首先就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的南京大屠杀问题继续进行探讨。一组是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负责撰写南京大屠杀部分的中方外部执笔者——张连红的《如何记忆南京大屠杀——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的学术对话》一文,以及与之相对的是共同研究中负责撰写南京大屠杀的日方委员——庄司润一郎的《“日中历史共同研究”之回顾——以南京事件为主体》一文。两文的作者均为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参加者,且都负责“南京大屠杀”部分的撰写工作,虽在会场上时有争执,在学术观点上也不尽相同,但在“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中均能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进行学术对话与交流。前述两文与其说是对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讨论南京大屠杀问题的回顾,不如说是研究南京大屠杀问题的继续“检讨”。

另一组文章分别是,任教美国的华人学者杨大庆的《国际历史对话与南京大屠杀研究》,以及长期关注和研究南京大屠杀问题的日本专家笠原十九司的《日中历史共同研究与南京大屠杀论争在日本的终结》。两文的作者虽非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参加者,但一直以来关注南京大屠杀问题,关注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进展,故而,他们通过中日共同研究中的“南京大屠杀”研究情况和结论,感

到了中国学者在这方面研究的长足进步和客观立场。杨大庆以二战后德法两国关于历史问题的对话为例,指出进一步加强在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国际化对话的重要性。笠原十九司指出日方委员筑波大学的波多野澄雄与防卫省防卫研修所的庄司润一郎共同撰写“南京攻略与南京虐杀事件”一节,以两页的篇幅介绍了南京大屠杀的原因、经过、屠杀内容、东京审判和南京审判中提到的屠杀人数,以及中国方面认为是30万以上,而“日方研究以20万以上为上限,其他还有4万人、2万人等各种推算”的情况,认为中日共同历史研究肯定了南京大屠杀的存在,是对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致命一击,标志着日本国内南京大屠杀论争的终结。

(二)日本侵华研究

不过,出于时代使命感和学术责任感的中国学者,继续寻找更多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力证,从学术角度继续深入研究这一问题。经盛鸿先后发表了《南京大屠杀前后的金陵大学(鼓楼)医院》(《民国档案》2010年第2期)和《延安中共报刊和图书对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和评论》(《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9期)两文。前文主要介绍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前后,金陵大学(鼓楼)医院的中、美医护人员,在“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领导下,抱着人道主义精神,不顾危险,奋勇抢救中国伤病员,以及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向国际新闻界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英雄事迹。后文则以抗战时期延安地区的《新中华报》、《解放》周刊,以及《日本在沦陷区》等中共方面的报刊图书,对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揭露、报道与评论,批驳日本右翼人士所谓的中共对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没有记录”,更“没有加以指责”的谬论,以及由此妄图否定南京大屠杀的险恶用心,具有相当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2010年中国学者在南京大屠杀的史料发掘中,有以下三篇文章值得注意。一是程兆奇在《小川关治郎证词的再检讨——东京审判有关南京暴行罪被告方证词检证之二》(《江海学刊》2010年第4期)一文中,通过比对第十军法务部日志、中支那方面军军法会议日志和小川关治郎日记等事发时第一时间的日军军方记录和小川自己的记录,证明小川在东京审判所作的证词为伪证,认为小川证词隐瞒了本应公开的战时日军暴行,妨碍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原告日本战犯的责任追究,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战后日本人对其侵华战争罪行和战争责任的认知。这是一篇“借力打力”,重新检讨反方史料的力作。二是戴袁支在《有关1937年淞沪抗战、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见证人辛德贝格的一组外文史料》(《民国档案》2010年第1期)一文中,公布了从丹麦收集到曾目睹日军南京暴行的辛德贝格的一部分外文史料,再次佐证了日军在南京的血腥暴行,弥补了一些史料中未有的日军南京暴行的细节。三是刘峰的《中国档案文献遗产——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专题档案》(《档案与建设》2010年第6期)一文,比较系统地介绍了日军南京大屠杀专题档案的情况,对于南京大屠杀研究者,尤其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初学者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学界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比较研究和对日军暴行心理分析的成果并不少见,但英尼尔·格雷戈尔和杨夏鸣合作发表的《纳粹屠杀与南京暴行的研究:范式转变与比较启示》(《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一文,仍颇有新意。如,他们在文中认为希特勒第三帝国的系列意识形态信条,如民族主义、殖民主义等构造了众多德国人愿意参与纳粹犯罪的条件;而民族主义的心态和认同导致了受害者和加害者之间共有的人性感的降低,不仅导致后者道德标准的丧失,更使后者具有某种优越感和对其他民族的轻蔑心态。作者将这些心态作为对纳粹屠杀和南京暴行进行比较研究的起点,并将殖民地经历、暴力制度文化等作为比较研究的重要内容,这样的研究视角相对于学界既有成果中侧重于对比两国的历史文化、近代化之路,以及对战争责任认识的不同而言,确实具有一定的新意。当然,李玉胜、孙孝科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之心理分析》(《社科纵横》2010年第11期)一文,也分析了日军实施南京大屠杀的心理,认为“日本军国主义才

是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这种观点具有一定道理，但切忌将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虚无化。

侵华日军实施违反国际法的细菌战，给中国军队，尤其是无辜平民造成了巨大伤亡。至于具体伤亡中国军民人数，则因为战争期间统计不易而遗漏不少，故成为中国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谢忠厚在《日本侵华细菌战伤害中国军民人数问题之研究》（《武陵学刊》2010年第5期）一文中，认为学界既有研究成果中的“疫患者约237万人，其中死亡约65万人”远低于实际患亡军民人数，指出根据其调查研究初步认为在日本侵华细菌战中，中国受害染病患者约700万人，其中死亡约200万人。当然，65万人说也好，200万人说也罢，至少都证明了战时日军对中国实施了大规模的细菌战，造成了中国军民大量伤亡这一不争的事实。

故而，中日两国学者围绕战时日军的细菌战和细菌战研究，以《武陵学刊》和《文史春秋》等刊物为平台，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按照文章内容主要分为以下几类。一是对日军七三一细菌部队的研究，主要有陈致远的《731部队的创建时间和历史名称考》（《武陵学刊》2010年第2期）和《1939年731部队“诺门罕细菌战”》（《武陵学刊》2010年第5期）两篇文章。前文根据相关历史资料考证，七三一部队在哈尔滨背荫河的创建时间为1932年，在哈尔滨平房的营建始于1935年，而“七三一部队”之称始于1941年，此前该部队的历史名称有“关东军防疫班”、“关东军防疫部”、“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加茂部队”、“东乡部队”、“石井部队”等，详细介绍了七三一细菌部队的创建时间和历史名称。后文则介绍了1939年日军在日苏“诺门罕战役”中首次使用细菌武器，虽然战绩平平，但获得了日本大本营的全力支持，部队经费增加到1000万日元，人员也由数百人扩充至3000人，故作者认为“诺门罕细菌战”在日军细菌战发展史上具有“重大影响”。

关于日军七三一细菌部队的研究，还有罗建忠分别与吉见义明、近藤昭二合作发表的《〈井本日记〉的发现及其内容的真实性和价值》（《武陵学刊》2010年第2期）和《美苏日三国对“731部队”的研究状况》（《武陵学刊》2010年第5期）两篇文章。前文介绍了《井本日记》的主要内容，认为其记载与哈巴罗夫斯克审判中七三一部队有关战犯的供词，以及中国相关文献档案记载吻合，从而证实了“细菌战是日本最高当局的战争行为，是一种国家犯罪行为。”近藤昭二在后文中分别介绍了美国、苏联、日本研究七三一部队的学术史，意在与中国学者进行交流，并希望各国学者都能运用各相关国家的资料综合研究，以推动七三一部队研究的发展。

二是对“荣”一六四四细菌部队的研究，主要有朱清如的《“荣”1644部队研究述评》（《武陵学刊》2010年第2期）、《“荣”1644部队与常德细菌战》（《武陵学刊》2010年第5期）两文。前文主要是介绍“荣”字一六四四部队的学术史，提出了今后加强“荣”字一六四四细菌部队研究的方向。后文则在介绍“荣”一六四四部队对华中地区中国军民实施细菌战的罪恶历史后，重点介绍了该部队参加1941年常德细菌战的实况，以及常德细菌战所引发的当地鼠疫，肯定了常德地方当局、湖南省卫生处、中央卫生署的防疫工作，进一步细化了“荣”一六四四细菌部队的研究。

三是对日军侵华细菌战战役、细菌战危害，以及对其定性研究。闫春河的《侵华日军“十八秋”细菌战》（《文史春秋》2010年第12期）一文，分析了日军于1943年秋在山东西部和河北南部交界处发动的“十八秋”细菌战战况，以及这次细菌战对中国军民造成的危害。陈祖樑在《日军细菌战所致云南人民受害与死亡情况调研报告》（《保山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一文中，根据自己的调查采访，认为日军在云南发动的细菌战至少导致20万无辜平民丧生。因此，李敏红在《“细菌战”是反人类反道德的野蛮屠杀》（《文史春秋》2010年第12期）一文中，认为“细菌战”是人类的“公敌”，而日本政府公然违反国际法有关规定发动了反人类、反道德的野蛮大屠杀。刘汝佳的《日本在中国进行细菌战的态度》（《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一文，结合二战期间日本在中国进行细菌战，以及日本国内对使用细菌武器的态度，认为日本在中国实施细菌战是蓄谋已久且精心策划

的,并非某些右翼分子所言的“乃是一部分军官的个人行为”。

强征慰安妇既是战时日军暴行的代表性行为,又是一项延伸至今的战争遗留问题,近二三十年来颇受国内外学界关注,但在2010年的史学界研究中似乎显得有些沉寂。截至目前,笔者仅发现两篇有关文章。一是陈丽菲整理发表的原慰安妇周粉英老人的访谈史料,即《“我是1号”——周粉英老人二战时期被强迫为“慰安妇”的访谈史料》(《史林》2010年第S1期)一文。二是刘萍的《日本学者眼中的日军性暴力问题——〈发生在黄土村庄里的日军性暴力——大娘们的战争尚未结束〉读后》(《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2期)一文。两篇文章一是史料整理,一是有关慰安妇研究著作的书评,皆非专题研究。尽管不少原慰安妇的相继故去,慰安妇索赔诉讼运动也都相继败诉,但从学术视角研究慰安妇问题,仍有不少值得继续挖掘的空间。关于战时日军其他暴行的研究,还有居之芬的《论日军强掳虐待华南强制劳工的罪行》(《民国档案》2010年第4期)和马永的《日伪统治广州时期的烟毒业》(《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两文。前文根据战后日本企业遗留的相关劳工档案、海南各县的劳工调查、战后当事人及受害劳工的证词等,论证和阐释了战时日军在以海南岛为中心的华南各地,强掳华南劳工的主要渠道与手段、强征决策与执行体系,以及强征华南劳工的人数及其虐待、残害华南劳工的罪行等。后文主要阐述了日伪当局统治广州时期采取纵容和保护烟毒业的策略,以毒化中国人的身心健康,搜刮社会财富,支持其侵略战争,遂致烟毒横流,民众深受其害。

战后日本政府没能妥善处理强制劳工、慰安妇、细菌战、化学战等战时日军暴行,以致其成为悬而未决的“战争遗留问题”。如,颇受中日两国民众和学界关注的日军遗留中国化学武器问题,至今未能彻底解决。付小军在《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问题研究》(上海师范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一文中,指出了日本遗留化学武器问题的历史背景,强调中日两国虽签订《中日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但“日方处理态度消极,处理进展极其缓慢”。这也是日军战争遗留问题迟迟没能解决的重要原因。孙国华、王海燕的《处理日本遗留化学武器作业卫勤保障实践与体会》(《解放军预防医学杂志》2010年第3期)和毛志勇的《日遗留化学武器作业现场医疗保障工作的组织与实施》(《华北国防医药》2010年第1期)两文,主要是阐述处理日军遗留化学武器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和事项,降低销毁日军化学武器时的伤残率,为完成挖掘日本遗留化学武器作业的卫勤保障任务提供借鉴。

面对战争遗留问题和随之而起的索赔运动,日本政府往往以已经“外交解决”和时效限制等原因,搪塞亚洲受害国民众提出的对日索赔诉讼运动。这已引起中国青年学者的关注,并成为其研究对象。如,熊玉琳的《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中的安全保障义务问题浅析》(中国政法大学,2010年硕士论文)一文,重点探讨了强制劳动关系中日本国及其企业是否对被强制劳动者负有安全保障的义务,在此基础上简要分析了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面临的新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曹嘉嘉的《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时效与除斥期间问题浅析》(中国政法大学,2010年硕士论文)一文,以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判例为基础,着重从日本国内法的角度对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时效和除斥期间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分析限制时效和除斥期间的适用与公平正义理念的关系。金新林的《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研究》(上海师范大学,2010年硕士论文)一文,比较研究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达成的三份和解:花冈和解、大江山和解、西松和解之间的异同和意义,认为存在中日政府间政治解决侵华日军细菌战问题的可能性,希望日本政府以大局为重,为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抗战时期的中日关系研究也取得了一定进展,其中以下几篇论文的观点颇有代表性。一是李小白、周颂伦的《日本北进、南进战略演进过程述考》(《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1期)一文,选择学

界热议的日本“南进”和“北进”两种战略论调进行讨论,结合当时国际形势,详细介绍了日本从“北进”最终转向“南进”的对外战略调整过程,属于老题新论之作。二是王春英的《日本在华占领区内的排英运动——以 1939 年英资轮昌公司罢工案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10 年第 6 期)一文,介绍了 1939 年日占区的排英运动,认为这一运动的目的是打击英国近百年来在中国所建立的权威,塑造以日本为中心的殖民认同,但没能得到沦陷区民众的认可和支持,最后以失败告终,反映了欧洲大战前后日本与欧美列强在华利益争夺的复杂关系。三是朱蓉蓉的《抗日战争时期的民间外交研究》(苏州大学,2010 年博士论文)一文,介绍了近代中国民间外交的历史轨迹和抗战时期中共、国民党政府开展民间外交的情况,认为“民间外交活动,是对官方外交的重要补充,有力地配合了国民政府官方外交的开展,争取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事业的同情与支持。”同时“还加深了各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声望。”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四是黄凤志、逢爱成的《德法和解历史对中日建立战略互惠关系的借鉴与思考》(《东北亚论坛》2010 年第 5 期)一文,以法德历史和解为例,提出“中日走出历史问题争论和民间对立情绪困境的出路在于中日政治家们是否有智慧搭建两国战略合作和战略互惠的目标与框架。”其实,中日两国历史学家都已注意到法德历史和解,对解决中日历史问题所带来的启示,但中日两国之间更加复杂的关系使之无法照搬“法德经验”,只能寻找更加切实可行的“中日模式”。

(二)中国抗战研究

1. 经济与社会方面的研究

经济与社会方面的研究成果在今年的抗日战争研究中依然占据了非常大的份额。

经济方面集中的研究方向有以下几点:

第一,中共在抗日根据地的经济政策,包括减租减息和农贷等。

减租减息方面,主要论文有黄正林的《地权、佃权、民众运动与减租运动——以陕甘宁边区减租减息运动为中心——》(载《抗日战争研究》第 2 期)和王建国的《华中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运动探析》(载《中共党史研究》第 6 期)。黄正林论文的突出价值在于突破了以往对减租减息政策简单定性的论述方式,从农村社会变迁的视角,通过对减租减息前后陕甘宁边区情况的对比,以及对减租减息政策在实施过程中所遭受的挫折进行分析,全面阐释了陕甘宁边区地方社会的特性与减租减息政策从提出到落实适应当地实际情况的发展过程,史料丰富,论证扎实。王建国的论文着眼于华中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运动中的矛盾,从矛盾的形成、中共的应对,问题的解决和影响几个方面,对华中地区的减租减息政策做出了不同的解读,重点突出,分析透彻。

农贷政策方面,主要有王志芳《抗战时期西北农民银行的农贷》(载《抗日战争研究》第 2 期)。该研究选取晋绥根据地的西北农业银行作为考察对象,论述了其成立以及在农贷政策中的活动。虽然其关注点较具体,在与其他银行的对比方面阐述稍显不足,但对于了解晋绥根据地农贷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此外,刘卫东《抗战时期山东北海币与法币的关系述论》(载《中国经济史研究》第 3 期)是从货币政策的角度讨论抗战时期山东北海币与法币关系的研究,值得关注。

第二,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

关于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方面,今年的研究成果涉猎的主题较多。陈雷《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粮食统制》(载《抗日战争研究》第 1 期)和罗玉明、李勇《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粮食统制政策述论》(载《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2 期)是对国统区粮食统制政策的考察。两者都注意到以往研究疏于该政策必要性的阐述,因此都在各自的研究中对国民政府粮食统治政策的必要性、实施以及历史作用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但是,在核心的必要性问题上,两者依然存在分歧:陈雷认为抗

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就认识到粮食统制的必要性,而罗玉明、李勇则认为1939年至1941年的粮食危机才是造成这一政策出台的主要原因。郝银侠《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棉田征实制度研究》(载《抗日战争研究》第2期)是对目前学界尚未有专门研究的棉田征实制度的研究。由于该制度是抗战时期田赋政策的一部分,所以郝银侠的研究对于全面了解国民政府的农村制度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王红曼《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银行监理体制探析》(载《抗日战争研究》第2期)在对清代以来中国银行监理体制进行简单梳理的基础上,考察了国民政府战时多元化银行监理体制的形成和制度建设、效率等内容。如果说王红曼的研究关注的是抗战时期整个银行制度,那么易棉阳的《抗战时期四联总处农贷研究》(载《中国农史》第4期)则将研究范围进一步缩小,选择身为银行监理机构之一的四联总处作为考察对象,对其农贷活动进行了专门研究。方世藻的《论蒋经国“建设新赣南”的社会救济》(载《抗日战争研究》第1期)是对蒋经国施政内容的考察。通过他在赣南地区的社会救济的内容、措施、作用进行综合分析考察,阐述蒋经国施政的思想渊源和历史局限性。该研究的价值在于为我们研究地方政策提供了对施政本人进行考察的视角。江满情《论战时民营工厂内迁中的国民政府与企业主》(载《抗日战争研究》第2期)着眼于考察政策实施的过程,阐述了抗战时围绕内迁问题国民政府与企业主的博弈,避免了以往只注重施政,不注重互动的叙述模式。

第三,抗战时期的金融界。

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朱荫贵《论抗战时期的杭州钱庄业》(载《安徽史学》第1期)。该研究利用满铁调查的第一手资料,对以往因史料限制而难以得其门而入的中国传统金融机构——钱庄,从组织特点到经营状况做了深入浅出的分析,最后得出结论:善于根据社会环境变化和自身特点不断进行调整和修正,以获取生存空间并赚取利润,是钱庄业具有的比较明显的特点,同时这也是在近代中国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能够保持生命力顽强的根本原因所在。其论述所用材料在中国属于首次发掘利用,值得关注。魏建克、高尚斌《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私营商业兴存考析》(载《抗日战争研究》第4期)是对抗战时期私营商业的考察。该研究以陕甘宁边区的私营商业为例,对中共执掌政权时期私营商业发展的地区分布、发展比重和业务性质的变化进行了分析。

社会方面,主要为农村社会改造和妇女改造问题。

岳谦厚、张文俊《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中农经济”——以1942年张闻天兴县14村调查为中心的研究》(《晋阳学刊》2010年第6期)通过对张闻天1942年对兴县14村农村经济状况的调查结果的分析,考察了当地中共农村改造前后乡村经济、政治结构的变化。该研究使用的是社会史研究方法,通过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为了解地方社会在抗战时期的变迁提供了最直观的印象。吴永《一九四一年陕甘宁边区“救国公粮”征缴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论析》(《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9期)和王建华的《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农户计划》(《中国农史》2010年第1期)、《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识字运动》(《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2期)是对抗战时期中共改造乡村社会实践的考察,对于理解抗战时期中共方针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张志永《从边缘到主流:抗战时期华北农村妇女特殊亚群体的演化》(《史林》2010年第1期),通过对华北根据地妇女改造问题的考察,关注抗日战争在中国走向近代化过程中的社会历史影响,阐明根据地的建立不仅为民族革命战争提供了战略基地,也初步整合了一盘散沙般的社会各阶层,促进了偏僻、落后的华北乡村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岳谦厚、罗佳《抗日根据地时期的女性离婚问题——以晋西北(晋绥)高等法院25宗离婚案为中心的考察》(《安徽史学》2010年第1期)是以女性离婚为视角,对抗战时期作为社会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婚姻制度进行的考察。

2. 思想文化方面的研究

思想文化方面的研究有以下两篇论文值得关注。

一是张龙平《调适、规划与重建：抗战时期的中华基督教教育会》（载《抗日战争研究》第3期），一是汪洪亮《1940年代川西羌族地区的教会教育——以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为例》（《抗日战争研究》第3期）。两者都是对抗战时期中华基督教团体为考察对象的研究。张龙平研究关注抗战对中华基督教教育会的影响，利用丰富的期刊、档案资料对抗战爆发以来教育会的变迁与活动进行了细致的考察。以往对中华基督教教育会的研究多关注晚清，对于民国少有注意，尤其是抗战时期，几乎未见系统的研究成果。该研究的价值就在于丰富了中华基督教教育会研究，为理解抗战对基督教教育团体的影响提供了素材。汪洪亮的研究聚焦四川西部羌族地区的教会教育，对40年代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开展的边疆服务从内容到特点进行了系统地分析。该研究的价值在于对理解近代基督教对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化影响提供了个案参考。

3. 军事方面的研究

关于军事方面的研究，吴景平的《蒋介石与抗战初期国民党的对日和战态度——以名人日记为中心的比較研究》（载《抗日战争研究》第2期），查阅了全面抗战初期的蒋介石、张嘉璈、王世杰、陈布雷、胡适、徐永昌、王子壮、周佛海、翁文灏等人的日记，并比照其他文献，论证了1937年七七事变后约半年时间里，国民党的高层人士之中一度失败主义、悲观主义情绪弥漫，议和甚至乞和的主张若明若暗的过程。蒋介石在和战问题上亦不无踌躇，在作出抗战决定之前有过犹豫，对国际调解、大国介入有过不切实际的期望。但在抗战重大关头，蒋介石最终克服了动摇和干扰，抵制了“低调”妥协的主张，在领土和主权问题上表明了严正立场，确立了战时体制，主导、引领国民党作出抗战决策并予以实施。

关于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合作的问题，杨奎松的《关于中条山战役过程中国共两党的交涉问题——兼与邓野先生商榷》（载《近代史研究》第4期），分析了中条山战役爆发前的国共关系正处在一个互不信任的严重危机时期。虽然由于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的干预，中共中央未公开采取政治决裂和另立政府的行动，但中共拒绝与蒋介石的中央政府发生关系已是不争的事实；蒋介石要求中共出兵的真意，在于中条山对防守河南洛阳以及陕西西安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不愿轻易放弃，中条山以北、以东，又都靠近中共的武装根据地，在日军进攻的紧急形势下，蒋介石想到请中共帮忙，却又不肯放下身段，一定要拿人格、军誉、良心，甚至是抗日不抗日相要挟；中共回应的经过与拒绝出兵的原因：中共一方面向中央政府提出军饷等条件，一方面回复苏联军事总顾问崔可夫，说明中共军队一直在抗战，同时亦部署八路军配合作战，但中条山战役很快结束，国民党守军败退。作者在结语中指出，即便是配合苏联作战，不论日军攻苏与否，中共都不可能在军事上采取作战行动予以牵制。这证明中共对中条山战役的策略，并非纯粹是对国民党的，而是毛泽东一贯军事斗争思想的一种体现，和他坚持革命功利主义的一贯风格。

肖自力的《十九路军从拥蒋到反蒋的转变》（载《历史研究》第4期），论证了局部抗战时期十九路军从拥蒋到反蒋的转变。尽管十九路军与蒋介石有过长期的结合，但由于个人关系纽带的先天欠缺，基础不牢，随着九一八事变、淞沪抗战等时局的演化及国民党派系纷争加剧，内有陈铭枢急剧转变，外有反蒋势力助推，在抗日、“剿共”等问题上与蒋介石分歧日益突出，十九路军最终走上反蒋之路。

刘熙明的《国民政府军在豫中会战前期的情报判断》（载《近代史研究》第3期），论证了1944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在初期豫中会战中，以大规模兵力与机械化部队的闪电战，造成国军惨败的经过。国军失败的重要原因是蒋介石与军委会情报判断错误后，作了错误的军事部署。军委会情报判断错误有两个重点：一是在日军从黄河北岸准备至发动攻势的初期，始终误判为如往常人数不多的局部攻势；二是日军目的是歼灭国军主力，却误判为打通平汉线，因此将军队部署在地形平坦的

许昌,希图以阵地战配合附近山区精锐部队进行侧击。国军在许昌失利,在匆忙撤退中,通讯中断,遭日军围歼而惨败。

闻黎明的《关于西南联合大学战时从军运动的考察》(载《抗日战争研究》第3期),考察、论述了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合大学的青年从军运动不同阶段的从军意识、动员方式、服务特征等问题。指出:大学生的从军意义,在于运用现代化的科学知识与技能,补充了战时急需的知识资源,改善了军队的素质,提高了作战的能力,从而为战争的运转提供了有力的支援。

另一篇论述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文章,是孙玉芹、刘敬忠的《抗战末期的“十万知识青年从军”运动述评》(载《抗日战争研究》第3期),论述抗战末期,国民政府为挖掘高素质兵源,克服征兵流弊,发起十万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很快就有13万知识青年报名,青年军编为9个师,分驻南方各地集中训练,1946年秋,青年军大部复员的过程。结论认为:这场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在中国军事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客观上产生了非常积极的效果,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忱。它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备而科学的征召、管训、复员机制,在中国军事发展史上尚属首次;某种程度上提高了国民党军队的素质,并在军兵种建设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绩。

4. 政治方面的研究

有关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的审判中停止援用国民政府六法全书的研究,胡永恒的《1943年陕甘宁边区停止援用六法全书之考察——整风、审干运动对边区司法的影响》(载《抗日战争研究》第4期),论述了陕甘宁边区曾在1942—1943年经常援用国民政府“六法全书”,但在1943年下半年突然停止援用的原因。其原因是当时正在开展的整风运动和审干运动。运动使边区司法系统发生重大的人员调整,不少具有法学专业素养的知识分子干部为工农干部所取代。在阶级斗争思维的主导下,援用六法全书的行为受到批判。此后,判决无法律依据的现象越来越多,调解也更为流行。结论认为:关于极端的阶级思维导致边区停止援用六法全书以及解放前夕废除“伪法统”的历史事实,还有整风运动和审干运动,都值得重新审视和反思。

关于汪精卫叛国的研究,孙彩霞的《蒋介石对汪精卫叛国投敌之处置》(载《近代史研究》第4期)认为,蒋介石对汪精卫叛国投敌的处置,贯穿于汪逃离重庆潜入越南河内、在南京建立伪政府的全过程。在汪出走河内阶段,有关蒋的处置,在一些问题上尚值得商榷;在汪筹建伪政权过程中,蒋实施的处置,彻底揭露了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狂妄野心和汪的卖国嘴脸。汪清卫从此失去了曾被寄予的号召力和权威性。这期间,蒋介石还接应日本的和谈,使日本的蒋汪共组政权的计划落空。

有关三青团对地方政治的影响,杨焕鹏的《论三青团对浙江地方基层政治的影响》(载《抗日战争研究》第3期),考察了抗战时期三青团对浙江地方基层政权的渗透、控制、对教育文化及公益事业的参与控制的经历,指出:“它对地方基层政治的渗透与控制是中央政权加强控制地方的表现。”虽然“对于打破中国传统势力对基层政治的控制,推进中央政府对社会基层的改造,加强战时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充分发动浙江基层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抗战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三青团参与地方政治,加深了国民党政权本身固有的顽疾——派系斗争、基层政治党政分离与斗争,从而打乱了浙江地方政治秩序的正常运转,引起了浙江地方政治的混乱”。

关于抗日战争史的研究方式、方法上,袁成毅的《抗日战争史研究的若干“量化”问题》(载《抗日战争研究》第1期),从量化研究的角度,考察了中国两个战场抗战的战绩;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所作的贡献;中国抗战的人口与财产损失(包括侵华日军暴行以及战争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延误等)。认为:量化研究在抗日战争史中的广泛运用,使一些传统观点受到挑战,也使很多问题的研究得到了深化,这较之既往口号式的宣传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同时由于研究者立场不同,处理史料方法的差异,此外,或多或少由于受民族集体记忆的影响,量化中也存在着一些计量方法

上的不当或随意性问题。

二 日本方面的研究

2010 年日本的中日关系史研究,依然是分散多元和集中合作研究共存,而抗日战争期间的中日关系研究是重点中的重点的局面仍然没有改变。相对于学习中国历史学生减少的状况,中国近现代史学者的研究倒是推陈出新,不断有成果问世,盛况依然。

(一)抗战及其前后期间的中日关系研究。

森靖夫的《日本陆军及其走向日中战争之路》(日本陸軍と日中戦争への道),由米纳瓦书房出版,主要探讨的是日本军队的内部统制系统,指出 1931 年九一八事变时不是军部强硬而是软弱才出现了关东军下克上的局面,其中第六章研究了国民政府驻日公使馆的政治分析报告,认为其冷彻的分析给国内起到了很大的参考作用。

由岩波书店出版的笠原十九司的《日本军的治安战》(日本軍の治安戦),详细分析了日军治安战的各个方面,集中探讨了华北各个地区的治安战,对于了解该问题的全局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此问题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正是由于日本不得不抽出大量兵力和精力,来对付敌占区的反抗,才形成了日军大受牵制的泥沼,其与太平洋战场的连带关系也仍然有研究的余地。

高桥伸夫主编的论文集《救国・动员・秩序》(救国、動員、秩序),由庆应大学出版会出版,集中研究了从清末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为止的各种动员,特别是抗战期间对群众的动员,其中对于农民和女性以及下层社会动员的研究、救国和动员的关系,角度独特,饶有新意。

(二)教科书及历史认识问题。

历史认识问题,不仅仅是政治问题,也是学术问题,其扎实的学术研究当然是作为政治问题处理的基础,日本方面的研究有些值得我们借鉴。

《近代中国・教科书和日本》(近代中国・教科書と日本)一书由并木赖寿等人主编,出版社是研文出版,该书是近年教科书研究的集大成,举凡清末、民国时期教科书状况,政治问题和教科书、教科书与抗日的关系等都有专门的研究,是该问题的必备参考书。

服部龙二的《日中历史认识》(日中歴史認識),由东京大学出版会出版,该书围绕田中奏折展开,梳理了从 1927 年到 2010 年该问题的历史脉络,不论其论点是否可以接受,该书都可以说是到目前为止对于田中奏折问题最为详尽的整理和论述。

小林道彦和中西宽主编的《超越历史的桎梏》(歴史の桎梏を超えて),由千仓书房出版,该书就如何超越历史的束缚,建立新时代的中日关系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和尝试,其中第一部分是围绕近代中日关系展开的,伊藤博文的中国观、日本对辛亥革命的反应、加藤高明与二十一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围绕中国的日美英关系及其日本的反应等论文都有参考价值。

(三)留日学生的研究。

留日学生的研究依然有不错的收获。

周一川的论文《满洲国的女性日本留学》(「満洲国」における女性の日本留学),刊载于《中国研究月報》第 64 卷第 9 号,对于“满洲国”时期的留日女学生做了概括性的整理和分析。

王元的《中华民国权力构造中的归国留学生》(中華民国の権力構造における帰国留学生の位置づけ),由白帝社出版,该书分析了 1928—1949 年归国留学生的概况以及他们的工作领域、政治倾向,探讨了他们的历史作用。

（四）东北及满洲国的研究。

自19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的“帝国主义”研究开始转向“帝国”研究,“日本帝国”受到了空前的关注,其可以正面评价的部分是,从日本帝国的全局来研究台湾、朝鲜和中国东北的问题,有些比较研究有新意。与此相关的是,中国东北及满洲国问题受到持续关注。

北野刚的《日本的大陆政策和防谷令问题》(日本の大陸政策と防穀令問題),刊登于《史学杂志》第119编第9号,该文围绕防谷令问题,讨论了日本大陆政策的展开和变化。

远藤正敬的《近代日本殖民统治中的国籍和户籍》(近代日本の植民地統治における国籍と戸籍)一书,由明石书店出版,该书比较研究了日本殖民时期台湾、朝鲜和中国东北的国籍和户籍问题,指出日本对殖民地实行同化政策的同时,又根据血统和民族进行严格的区别对待。

（五）租界问题的研究。

大里浩秋等人主编的《中国和朝鲜租界的历史和建筑遗产》(中国・朝鮮における租界の歴史と建築遺産),由御茶水书房出版。该书是历史学者和建筑学者的共同研究成果。2001年神奈川大学建立了租界的研究小组,展开租界研究,并于2006年由御茶水书房出版了《中国的日本租界》(中国における日本租界),该书集中研究了重庆、汉口、杭州、上海的日本租界。这次扩大了研究范围,对天津、青岛的日本租界,以及清朝在韩国的仁川设立的租界也进行了研究,并邀请了建筑学者加入,共同进行现场调查,是个有益的尝试。

除此以外,青山治世《行使领事裁判权的中国》(領事裁判権を行使する中国),刊载于《东亚近代史》第13号,讨论了《中日修好条规》中关于互相领事裁判权条款的形成和行使事例,分析了清朝的动机和实际的运用。森川裕贯的《五四前后高一涵思想的形成》(五四前後における高一涵の思想形成)发表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第25号,探讨了日本思想界对高一涵思想形成的影响,石塚迅等人主编的《宪政与近代中国》(憲政と近現代中国),由现代人文社出版,该书集中探讨了民国时期对于宪政的尝试,指出该尝试虽然失败,但依然具有历史的价值。

（六）近代日本在中国的经济活动、中日文化教育交流活动、日军暴行和罪责,以及中日关系史等方面的内容,也颇受日本学者关注。

如,日本在华经济活动方面,今并就稔的《日中战争时期上海的火柴制造业与日本》(《中国研究月报》2010年第6号)一文,选择了当时作为生活必需品的火柴制造业为研究对象,探讨了该行业的生存、发展及其与日本之间的深层关系,颇有新意。

中日文化教育交流活动历来是日本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在2010年的学术研究中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如,大里浩秋的《1936、1937年华侨学校教科书取缔事件》(《中国研究月报》2010年第1号)一文,介绍了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前夕华侨学校教科书被迫取消的事件。孙安石的《南京国民政府与教科书审定——以教育部编审处与国立编译馆的会议记录为中心》(《中国研究月报》2010年第4期)一文,根据教育部编审处与国立编译馆的会议记录,分析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教科书审定制度及其影响。娜荷芽的《关于内蒙古近代教育研究的展开——以“满洲国”(1932—1945)为中心》(《中国研究月报》2010年第8号)一文,重点介绍了满洲国范围内的内蒙古地区的近代教育问题,阐述了日伪统治者在内蒙古实施近代教育和开展相关研究的情况。

在日本进步学者的努力下,日军暴行研究取得了一定发展。如,竹内康人的《陆军航空部队的毒气战研究、演习》(《静冈县近代史研究》第35号,2010年10月)一文,重点介绍了从1936到1937年的日本陆军航空毒气战研究计划和实用毒气弹的情况,作者认为航空毒气战的史料较少,要求日本政府调查毒气战真相,且全面公开毒气战史料,并为救济毒气战受害者进行立法。桂川光正在《围绕关东州鸦片令制定的一个考察》(《大阪产业大学人间环境论集》第9号)一文中,阐述了关东

州鸦片令制定的经过及其公布后产生的影响,指出因为日本在殖民地、租借地统治的财政困乏,故通过发布关东州鸦片令,事实上承认了在关东州可以“自由吸食鸦片”,以此弥补其殖民统治的财政不足。

当然,日军暴行与战争遗留问题本身就是因果关系,因此,日本进步学者一直在为解决中日之间的战争遗留问题而努力,帮助中国受害者对日索赔诉讼并使之与日本个别企业达成了“和解”。如,内田雅敏的《西松广岛安野和解的现在》(《战争责任研究》2010 年冬季号)和松刚肇的《关于中国人强制连行、强制劳动事件与西松建设信浓川和解》(《战争责任研究》2010 年冬季号)两文,就是介绍强制劳工在诉讼活动中与日本企业达成“和解”的情况。至于慰安妇问题,江上幸子在《被战时性受害者称作的“耻辱”》(《近きに在りて》第 58 号)一文中,剖析了战时性受害者在当时以及以后的生活中将慰安妇经历视作“耻辱”的心理状态。等松春夫在《历史是面镜子吗?》(小林道彦、中西宽编:《超越历史的桎梏》,千仓书房 2010 年)一文中,通过比较在中国大陆、台湾、韩国、日本、美国采用率最高的高中、大学历史教科书中,对“南京大屠杀事件”、“袭击珍珠港”、“战时下的强制劳动”、“九一八事变”、“东京审判”等事件的不同叙述,论述了各种历史教科书所引导的各国民众对历史的认识,以及各种历史教科书所反映的各国社会情况,质疑历史究竟是不是一面“镜子”?

在中日关系史研究上,重新检讨币原外交和利用《蒋介石日记》再次审视中日战争时期的和平交涉问题,似乎成为了 2010 年抗战时期中日关系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如,种稻秀司先后发表《九一八事变时币原外交再检讨(一、二)》(《政治经济史学》第 526、527 号)两文,重新检讨了九一八事变时的币原外交,指出日本为延续和扩大在满蒙的权益和地位,向东北奉系军阀提出了满蒙五铁路要求,而通过北伐战争和张学良东北易帜形式上统一中国的蒋介石,则否定了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利益”。本文作者认为日本关东军利用中国国内的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和国共内争,趁机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本应在对外交涉中处于优势地位的外务省,则因此失去与中国直接交涉的机会。这就使日本陆军“暴走”的情况日益严重,最后走向了中日全面战争。

冯青的《蒋介石对日中战争时期和平交涉的认识和对应》(《军事史学》第 45 卷第 4 号)一文,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新近公布的《蒋介石日记》为基础,阐述了早在 1939 年春蒋介石就已减消对日和平交涉的想法,但 1940 年 7 月后,他又再次考虑中日和平交涉的可能性。不过,同年 9 月 27 日,德、意、日三国同盟缔结之后,蒋介石看到了三国同盟与英美之间的矛盾,以及他们两大集团将来走向冲突的可能性日益增大,确信中国国际地位必将因此提高,故决定停止对日和平交涉。其实,蒋介石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一边抵抗日本的军事进攻,一边并未彻底放弃日本政府伸来的“橄榄枝”,但随着三国同盟集团与英美矛盾的加剧,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增强了蒋介石“抗战必胜”的信心,且 1942 年 1 月的《联合宣言》更是禁止联合国与日本单独进行和平交涉。

(作者:高士华,日本东北文化学园大学综合政策学部教授;徐志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高莹莹,近代史研究所编辑;李仲明,近代史研究所副编审)

(责任编辑:荣维木)